

# 忘掉过去就会重蹈覆辙

## ——叶永烈谈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蔡葩 实习生 黄智

### 作家访谈

著名作家叶永烈，花费二十多个春秋，经过广泛采访，完成的180万字纪实长篇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，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是一部关于“四人帮”的纪实长篇，是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重要作品。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进行写作，希望通过“四人帮”兴亡史的深刻揭露，批判极左思潮，防止“文革”卷土重来。

**海南周刊：**有关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历史，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，是什么原因让您对这段历史特别关注？

**叶永烈：**“文化大革命”作为一场悲剧、闹剧、惨剧，早已降下大幕。1980年9月26日，“文革”集团的十名主犯被押上审判台。那些日子，我坐在荧光屏前，收看那举世瞩目的历史审判，发觉审判中披露出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，比任何虚构小说都更具有震撼力！于是萌发了写作反映“文革”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……

巴金《随想录》和美国威廉·夏伊勒的长卷《第三帝国的兴亡——纳粹德国史》都给我动手创作以思想上的启发：“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”。我希望通过写作，深刻揭露“四人帮”兴亡史，批判“极左”思潮，防止“文革”卷土重来。

**海南周刊：**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是一部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重要作品，您作此选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？

**叶永烈：**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开始着手写作以上海“文革”十年为内容的《上海的拼

搏》，但在采写过程中发现这样写具有局限性，因为《上海的拼搏》只限于上海的“文革”，而上海的“文革”听命于北京。然后就将《上海的拼搏》扩大为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。后来由于题材太大，逐把“母题”分切成四个“子题”，即分成王、张、江、姚四部传记来写。

**海南周刊：**纪实小说的创作要求史实准确、立论正确。您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最深的体会是什么？

**叶永烈：**这本书的写作，时间跨度很长，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写作中“禁区”多，采访难。

首先，“禁区”多。“文革”档案是“禁区”。为了穿越这个“禁区”，我多方奔走，办了许多繁杂的手续。

其次，采访难。采访中，最困难的是“文革”中的风云人物。我进入过监狱、劳动工厂采访，不仅手续繁杂，而且办好手续后，这些人物都有很深的戒备心理，都是疑虑重重，不问不答，不愿录音，更不同意拍照。

尤其是对陈伯达采访，那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的。陈伯达身份特殊，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，国家对他的人身保护是很严密的，不允许人随便打搅。更困难的是陈伯达本人不愿接受采访，更不愿谈及那不堪的往事。

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前，充分做足了功课，研读陈伯达专案的相关材料和陈伯达的著作。到北京后并不直接采访陈伯达本人，而是打起“外围战”，即采访陈伯达的警卫员、亲人朋友等了解更详细的内容，包括他的性格喜好等。在采访时，尊重被采访者，摆正采访意图。还有，注意采访技巧，寻找询问的切入点，把握现场气氛。比如开始时，我对陈伯

达说：“陈老，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！”“哦，1958年，在什么地方？”“北京大学。当时，你带来了一个‘翻译’，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。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向中国人作报告，要带‘翻译’！”陈伯达听后，哈哈大笑。顿时，原本尴尬的采访气氛一下轻松起来。接下来的采访顺利很多。

**海南周刊：**您写“四人帮”，“死材料”得来尚且不容易，从当事人采访到第一手信息更难。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一“工程”，主要得益于什么？

**叶永烈：**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给了我很大力支持。上海作协要我写报告，报告写了好几次，开列采访名单，这个名单大概有100多人吧，包括要求查阅哪些范围档案、资料。之后，上海市委宣传部就在报告上盖章，我就凭这份介绍信去采访。一些重要单位连介绍信也不管用。后来基本就没有凭任何介绍信了，我去北京都是住公安部的招待所，公安部给我提供了很多便利。

**海南周刊：**写作这本书，您采访了很多人，普通老百姓对“四人帮”最一致的评价是怎样的？

**叶永烈：**老百姓没有一个对“四人帮”表示好感的，只有今天一些不懂事、叛逆的小青年才会胡说八道。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些年轻人呼“江青是杰出的女性”、“姚老，您走好！”，殊不知只要他们仍在台上，我们还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而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，他们推行的那一套极“左”的思想路线对中国造成了多严重的危害。



# 江青在毛泽东弥留之际的表现

### 精品书摘

毛泽东的生命列车，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。

9月上旬，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。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，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。

9月2日，“小兄弟”陈阿大来到北京，王洪文马上“接见”。陈阿大一回到上海，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：“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。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。江青同志、春桥同志、文元同志、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。只有紧跟他们，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！”

9月8日，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，请工人们吃文冠果。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，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，象征着‘文官夺权’！”

江青的话，透露了四个“文官”——王、张、江、姚的心声。

江青并没有参加值班。但是，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，她不住钓鱼台，住中南海。她在中南海的住处，就在毛泽东住处旁边。

9月8日，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危急之中。

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、陶寿淇、吴洁、陶桓乐、周光裕、方忻、王新德、翟树职、潘屏南、朱水寿、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，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：

9月8日，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，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，翻了危险。江青硬给主席翻身，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，血压上升，江青看情况不好，扬长而去。

8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，大家分头紧张工作，江青进来大吼“不值勤的都出去”，我们没有听她的。

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，江青拉毛主席医

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。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，我们没有同意。去天津小靳庄时，不顾主席病重，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，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。

主席生前，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，经常谩骂“医生是资产阶级的，护士是修正主义的”，干扰治疗。主席逝世之后，我们都很悲痛，江青却说：“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，看我现在就很高兴。”

毛泽东医疗组的这一揭发材料，载入中共中央《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（材料之一）》。

9月8日下午6时多——离毛泽东去世只有5个多小时，江青却心血来潮，突然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。

江青怎么会忽然跑到新华印刷厂呢？

据说，江青获得“情报”：有“特务”在那里搞她的“情报”，搞中共中央的“情报”！

江青所说的“特务”，并不是国民党特务，而是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高级特务”！

到新华印刷厂搞什么情报呢？

这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稿，在新华印刷厂排印。

江青突然跑到新华印刷厂，为的是在那里“查特务”！

据新华印刷厂连秀荣、韩致仁、李同彦、赵家玉、伊淑珍、姜信之、张世忠、葛运通、罗孟琦等九人在1976年10月30日所写的材料：

江青事先没有通知，突然来厂。江青一来直奔防震棚（引者注：在唐山地震之后，当时北京普遍搭建防震棚）。

当时棚里没有人等候。连秀荣同志赶来时，江对连发脾气。江说：“我就请了一个小时假，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？我从大寨来。”

当迟群、谢静宜来了以后，江急着问迟群：“你给我带来材料没有？”江青拿过材料批

划。江与迟、谢三人低语一阵子。

后来，江突然问：“小谢，我问你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答，你知道吗？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高级特务，监视我，搞我的情报。”

又说：“工人同志们要擦亮眼睛，提高警惕，谁是特务，站出来，自首，保护自首的。”

又问迟、谢说：“你别急，会弄清楚的。”

江又说：“我怕什么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

这时候，毛泽东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守在毛泽东床前的是张玉凤。

医生们忙于抢救垂死的毛泽东。

江青从新华印刷厂回来后，曾在毛泽东床前守候，夜深离去。

9月8日夜，毛泽东气息微弱。

当9月9日零时刚过，才十分钟，毛泽东停止了呼吸。

张玉凤奔出毛泽东卧室，疾步走向毛泽东书房，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、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汪东兴报告噩耗。

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，迅速得到报告，马上奔了过来。

后来，姚文元曾这样描述他在现场所见：

她头发散乱，神色慌张，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，一面呼喊：“医生呵！你们快救救主席呵！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！”

她嗓子都哭哑了，仍不肯离去。其悲痛之状，催人泪下。

姚文元所述，应当是真实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，到1976年，毕竟有着三十八年的夫妻感情。

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的。他，终年八十三岁。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，至1976年，长达四十一年。

摘自叶永烈纪实长篇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，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09年1月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  
《四人帮兴亡》